

---

# 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妇女纺织运动的考察

刘 萍

---

抗战中期,从生产度荒中发展起来的华北抗日根据地妇女纺织运动(简称妇纺运动),不仅为根据地顺利度过灾荒起过功不可没的作用,而且把抗战爆发后根据地妇女运动的发展推进到崭新的阶段,在中国妇运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历来研究者对该问题多有忽视,或限于就事论事中,对妇纺运动为何在1943年蓬勃发展以及形成相当规模的原因,妇纺运动在生产度荒、对敌经济斗争以及妇运发展史上的意义,特别是妇纺运动与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妇运指导方针转变的联系等都缺乏深入的研究。本文拟就上述问题作初步的考察,以就教于方家。

—

“男耕女织”曾是中国农村自然经济的传统模式,在洋纱洋布进入中国之前,甚至之后的相当长时期内,妇女从事手工纺织主要是以自给自足、满足家庭成员的需用为目的。随着二三十年代洋纱洋布的冲击,中国农村传统的家庭手工纺织业纷纷破产,在许多地方甚至销声匿迹。抗战爆发后,由于日军的封锁和破坏,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日益面临穿衣吃饭的困难。1940年底,晋西北抗日根据地首先号召“要广泛的发动家庭纺织事业,发动广大

的家庭妇女参加纺纱织布”，但这时手工纺织仅局限于纺织基础较好的地区，且规模相当有限。那么，手工纺织为什么在 1943 年大规模兴起呢？

华北根据地妇纺运动兴起的直接原因是根据地面临日益严重的自然灾害的威胁。从 1939 年秋开始，华北各地一直被各种自然灾害所侵袭，有的地方甚至接连遭受水、旱、病、雹、蝗五灾之害。特别是 1942 年至 1943 年，华北遭受了百年来未遇的大旱灾，仅晋冀鲁豫边区，受灾的地区就包括太行、冀南的全部，太岳的大部和冀鲁豫的一部分。冀鲁豫全区受灾的耕地面积达 2400 余顷，约占基本区财粮征收面积的 52%，受灾人口达 50 万（如包括轻灾区共有 120 万人）。在晋察冀的北岳区，灾荒波及 30 余县，灾民达 18 万人，其中重灾区冀西的阜平、曲阳、易、完、唐等中心根据地，难民达七八万人。1943 年秋，根据地又发生严重的蝗灾，飞蝗滚滚而来，所到之处，墙壁、道路都染成了褐色，一颗高粱上竟有六七百个蝗蝻。安阳、磁武、沙河等地，麦苗数十成百亩被吃光，一个巴掌能打死百余个蝗蝻。太行区有 23 个县，共 3000 平方里的土地受到蝗灾侵袭。饿死、自缢、溺婴、逃荒的现象普遍发生，灾荒严重威胁着根据地的生存。

灾荒袭来之时，华北抗日根据地正处于抗战以来最严重的困难时期，日军连续几年对根据地封锁、扫荡，使根据地原有的经济基础和积蓄消耗殆尽。百团大战后，日军集中侵华兵力的 64%，用以对八路军、新四军作战，从 1941 年 3 月—1942 年 12 月，日军先后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发动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为了扑灭抗日

---

《发动妇女纺纱织布——（抗战日报）社论》，见《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工业编），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43 页。

《华夫同志谈关于边区财政问题》，见《冀鲁豫边区财经工作资料选编》（上册），山东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贾林放：《太行区 1944 年生产建设的一般情况》，见《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 2 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78 页。

力量,日伪修筑了无数公路、据点、碉堡、封锁沟墙,制造了许多“无人区”,不仅毁坏了大片的良田沃土,也消耗了大量的劳动力。以晋冀鲁豫边区的冀南为例,日伪在此修筑了1103个据点和碉堡,每一据点和碉堡,要占耕地15亩,1103个据点和碉堡共占耕地16545亩,浪费1103000个老百姓的劳动力。修筑了3丈宽的公路9423里,每里要占9亩耕地,共占耕地84807亩;每修1里需50个劳动力,共浪费471150个劳动力。此外,又修筑宽3丈,深1.5丈的封锁沟和封锁墙3742里,占去耕地33678亩,浪费劳力6062040个。上述几项合起来共有135030亩耕地被强占,7636190个劳动力不能从事耕种。因此,经过日军几年的暴虐,根据地农失其时,力不逮耕,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根据地财政经济陷于困难,军需物资,生活必需品极端匮乏,也使抗灾能力受到削弱。如何战胜灾荒,安定人心,巩固根据地,成为华北各根据地政府面临的紧急任务。

为了战胜灾荒,华北抗日根据地政府相继发出了一系列救灾工作的指导,号召人民紧急动员,共度难关。1942年10月10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在发布的关于团结友爱,互助互济,度过灾荒的布告中,提出了边区政府的救灾措施,即“减轻被灾区域本年之财粮负担;并将调剂粮食,以供给民食;组织运输,奖励纺织合作,实行以工代赈;发放水利、纺织、救济各种贷款;以安置逃亡,藉维人民生业”。接着,晋冀鲁豫边区工商总局、救济联合总会在发出的《关于五、六分区灾情严重举行生产救济的联合指示信》中更明确提出了“在灾情特别严重地区,开展妇女纺织工作,以资救济”的生产救济措施。因此,“纺织救灾”作为生产救灾的一项重要举措之一,首先由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提了出来。同年11月,晋察冀边区政

---

吴宏毅:《从灾荒中站起来——记晋冀鲁豫边区的生产救灾运动》,见《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辑,第407页。

同上书,第332-333页。

府也向受灾地区发出了开展生产运销救灾工作的指示,在生产救灾中首先要开展手工纺织运动。山东抗日根据地 1942 年冬在各地相继成立了纺织局,具体领导纺织工作。从 1942 年冬开始,手工纺织运动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生产救灾工作中逐步开展起来,到 1943 年形成相当规模。为什么要将手工纺织作为生产救灾的重要措施之一呢?这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抗战爆发后,交通阻塞,布匹供不应求,使得在战前因洋纱洋布冲击而纷纷破产的传统手工纺织业开始得以复苏。比如在晋西北,1941 年底纺花车较战前增加约 30%,土机亦较 1940 年增加 40%,改良机为 1940 年前的三倍,这些都是开展手工纺织的客观条件。

第二,纺织不受农时和自然条件的限制,当灾荒严重时,将纺织品出售以换取粮食以解燃眉之急,无疑比其他生产措施具有立竿见影之效:抗战爆发后,根据地对布匹的需求量很大,纺织有利可图。

手工纺织在生产度荒中究竟能起多大的作用,晋冀鲁豫边区工商总局曾算过一笔帐。假定组织一个 110 名妇女的纺织合作社,每 1 个妇女每天纺 1 斤花(24 两秤)的线,两天把线织成 1.5 丈好布,能卖 40 元,1.5 丈好布的成本,以当时的工料价格计算,共计 32.7 元,1.5 丈布赚 7.3 元,这是合作社 1 斤花加 8 个工赚到的集体利润。110 个社员,除去两个经营的人,两个弹工外,一天能创造集体利润 94.9 元,每月以 25 天计,得到利润 2372.5 元,以 85% 为社会分配金,平均每人每月分得 15.84 元。社员个人所得,每月以 25 天计,弹工 175 元,纺工 41.5 元,织工 80 元。自纺自织的社员 53.14 元,加上分得的集体利润共 69.98 元,这是自纺自织的社员 1 个月的收入。每斗(小斗)小米以 30 元计算,1 个月的收入可买二斗二升来米,可以养活两个人,假如有母女两人参加纺织,则

---

庸庸:《保护土布生产》,见《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工业编),第 204 页。

4口之家可以不逃荒了。因此,太行区五、六分区在1943年明确提出:“要用突击的方式开展纺织工作,救活2万灾民。”

妇纺运动必须以广大的妇女参加为前提条件,运动能否兴起并取得成功?动员与组织广大的根据地妇女投身到手工纺织的行列中来,成为当时妇运工作的首要任务。1943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著名的《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简称“四三”决定)。《决定》在肯定妇女工作成绩的基础上,对妇运工作中存在的缺乏实事求是精神,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日益严重而导致妇女工作停滞不前的倾向进行了严厉批评。《决定》明确指出:“在日益接近胜利而又日益艰苦的各抗日根据地,战斗、生产、教育是当前的三大任务,而广大的农村妇女能够 and 应该努力参加的就是生产”,“提高妇女的政治地位、文化水平、改善生活,以达到解放的道路,亦须从经济丰裕与经济独立入手”,并进一步提出了“多生产、多积蓄”的口号。《决定》对如何开展妇女生产运动作了具体的指示:第一,深入农庄,了解妇女生产中的困难;第二,根据具体情况制定生产计划,特别强调生产计划一定要和妇女家庭的生产计划结合起来,要动员妇女实实在在参加到广大群众的生产中去;第三,根据妇女群众实际需要进行组织生产,反对有名无实的组织方式;第四,妇女的文化和政治教育,通过组织生产的方式进行。此外,对从事妇女工作的同志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四三”《决定》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妇运指导方针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标志,从此,根据地妇运工作从抗战初期“以动员妇女力量参加抗战,争取抗战胜利为基本任务”,转变到以动员妇女参加生产为基本任务。这个转变,适应了抗战形势的客观需要。

---

《晋冀鲁豫边区工商总局组织合作救灾计划》,见《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辑,第335-336页。

《太行五、六分区纺织救灾工作须知》,同上书,第337-338页。

《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版,第648页。

中共中央组织部:《妇女工作大纲》(1937年9月),同上书,第1页。

《决定》为华北根据地妇女纺织运动的开展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此后,根据地妇女工作的作风、方式、方法都有了彻底的转变。

## 二

手工纺织在华北农村发展是不平衡的,有的地区有一定基础,但相当一部分地区却没有基础,因此在动员组织之初,困难重重。各根据地遵照中央“四三”指示精神,根据本地的具体情况,采取了不同措施,解决纺织中的困难。

首先,各根据地政府规定,纺织生产的形式按实际情况和自愿原则组织,大致分为纺织合作社和纺织小组两种形式。为了救灾的需要,各根据地组织纺织合作社过程力求简单。比如在晋冀鲁豫边区,发动妇女集好社股(每股至少1元,每人至少一股)后就召开成立大会,通过社章,选出理事(至少3人),组成理事会,再由理事中推一人为理事主席,就可以进行登记,接洽贷款,开始营业。理事会是合作社的执行机关,负责购买棉花,分给社员纺织,再按件计工资,收取成品,向公营机关接洽统销等事务。纺织小组一般由外地逃荒来的灾民或落后村庄的妇女组成,也须选出2人为小组长负责纺织工作。沙区的纺织合作社较为成功,全区组织了200多个纺织合作社,将近一半受灾妇女都被动员起来参加了纺织运动。

其次是贷款、贷花、贷粮给纺妇。在晋察冀边区采取由县联社集中贷款的方式,县联社下按灾区需要设办事处,对村社进行领导,村社直接组织灾民纺纱织布。县联社通过村社将原料发到灾民手中,发棉取纱、发纱取布,然后发给工资。晋冀鲁豫边区制定了严格的贷款办法,以保证纺织贷款发挥最大效益。主要有以下几条:

1. 由工商管理局把借款拨到各灾区公营商店,经县救联会之介绍,灾民纺织团体(如灾民组织的合作社)负责人直接向公营商店借用;
2. 该项贷款纯用作以工代赈性质,收低利一分;
3. 借款不用抵押品担保,由灾民连环保证;
4. 参加纺织团体之灾民以团体名

义借款,不借给个人;5.每人以50元为借款标准;6.借款3个月以后分期归还,至次年夏秋后一个月内(六月底)还清,再以此款借给其他灾民;7.以盈余10%为合作基金,在成品交换时扣除,交公营商店保存,以为归还借款后组织合作社之股金;8.该款专用于灾民纺织,不得借出后移作他用。此外,针对不同情况,各根据地还采取贷花贷粮,贷纺车、织布机等不同办法,扶持手工纺织。在纺织运动初期,各边区政府投入的贷款数额是相当大的。1942年底,晋察冀边区拨出的约200万元救灾贷款,绝大部分都投入到了纺纱织布上。1943年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对太行东部地区,一次便发放纺织贷款180万元(冀钞)。

妇女动员组织起来后,如何解决原料的困难又摆在各边区政府面前。抗战爆发不久,各边区政府曾号召推广植棉,因此在产棉区棉花尚有一定收成。比如山东渤海区,年产可达2000万斤,自给有余。但总的说来,抗日根据地内棉花普遍匮乏。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各根据地政府大致采取了以下措施:

第一,活跃集市贸易,以价格刺激将农民手中的棉花吸引出来。1943年6月—8月,临城县政府因棉花不足,纺织工作处于停顿,从9月份开始,政府发展集市贸易,到12月,政府平均能从每个集上收花230多斤,收线240多斤;在石家栏一个集上,甚至从妇女手中收花1000斤。

第二,调动合作社积极性,开展棉花争夺战,吸收敌占区棉花。沙河区王典组织的合作社,在1943年,从敌占区组织了30万斤棉花入口,调剂了市场。

---

《晋冀鲁豫边区工商总局、救联总会关于五、六分区灾情严重举行生产救济的联合指示信》,见《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辑,第334页。  
《生产运销救灾工作的初步检查》,见《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714页。

齐武:《晋冀鲁豫边区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433页。  
《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辑,第265页。  
《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辑,第26页。

第三,大力推广植棉。各根据地都相继颁布了奖励政策。《太岳区植棉条例》规定:新植棉田区,免两年负担;种植收入抵不住庄稼收入时,政府按原地产量标准补偿;自己能积极种棉,并组织帮助其他人种棉,在植棉的过程中有新的创造,政府给予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奖金,并给予荣誉称号;棉花交公粮,高于市价的10%折收之。同时,各根据地政府大力推广植棉技术,从土地、种籽的选择到如何播种、施肥、去顶、打杈等都作了详细的介绍。在晋绥边区还专门开辟了推广植棉技术的农事试验场。经过政府和农民的努力,1943年,晋绥边区产棉100万斤。太行区24个县,1944年共种植棉花63213亩,全区共产棉90万斤,如将游击区武安植棉28463亩计算在内,全区共种棉91000余亩。太行区行署计划1945年植棉20万亩。

此外,在晋西北地区还推行节棉措施。晋西北行署决定,1943年部队冬衣尽量改絮羊绒与旧棉花,国营纺织工厂根据原料具体情况,试验毛纺,以代替一部分棉花。通过以上措施,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较顺利地解决了原料缺乏的困难。

针对纺妇缺乏技术的情况,各地组织了多种多样的纺织训练班,传授技术。比如晋绥边区政府在临北、兴县、神府等地开办了县、区、村纺织训练班。晋冀鲁豫边区成立了纺织指导所,具体指导纺织工作。以后针对纺织中质量差、浪费大的问题,各根据地又提出“精纺精织”的口号,改良织机,提高织花织布技术。

由于采取了积极的措施,进行了最广泛最深入的动员,参加纺织的妇女越来越多,最终形成群众性的生产运动。随着大生产运动的开展,妇纺运动又发展成为大生产运动的重要内容。

妇纺运动不仅在基础较好的地区,且在原本基础薄弱甚至毫

---

《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辑,第61页。

《晋绥边区行署关于发展纺织的指示》(1944年3月18日),见《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工业编),第231页。

同,第296页。



无纺织基础的地区也迅速发展起来。在纺织基础较好的晋绥边区,以临南为例,1943年有纺妇15324人,织妇9884人;1944年纺妇增至21928人,占全县人口近40%,织妇增至16604人,占全县人口30%强。纺织基础较为薄弱的地区,如晋绥边区的兴县,1944年纺妇(9200名)较1940年(300名)增加30倍,较1943年亦增加8.4倍,织妇1944年较1940年增加650倍,较1943年增加8.7倍。原本无纺织基础的地区,取得的成绩最为显著。以太行区为例,1943年上半年全区19个县共有纺妇64970人,每县平均3419人;1944年12月全区(6个老区)33个县有纺妇186948人,每县平均5665人,如把七分区4万人计算在内,全区纺妇达227000人。到1945年秋,仅新发展纺织的8个县即有纺妇73649人,每县平均9206人,比1943年的平均数增加了2.5倍。又如太岳区,至1944年6月底止,全区纺妇达7万余人。在晋察冀的北岳区,据对易县、龙华、满城、徐定、曲阳、唐县、阜平、云彪、平山、灵寿、徐唐等12个县不完全统计,到1943年8月,从事纺织的妇女达37883名。手工纺织在阜平山地的开展,还打破了有些人认为“山地没有开展纺织条件”的观念。在晋绥边区,从1943年至1945年,纺织运动由两个县发展到26个县。手工纺织的推广,促使华北根据地成千上万的妇女参加到纺织行列中,形成“家家纺线,户户飞梭”的热潮。

- 
- 《边区工矿业概况》,见《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工业编),第55-66页。  
贾林放:《太行区1944年生产建设的一般情况》,见《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辑,第145页。  
齐武:《晋冀鲁豫边区史》,第433页。  
《太岳区1944年上半年生产运动成果》,见《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辑,第145页。  
《北岳区的妇女纺织业》,见《解放日报》1943年8月24日。  
《北岳区当前的灾荒和我们的斗争(1943年4月)》,见《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编),第727页。  
《抗日战争时期晋绥边区妇女工作概况》,见《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第815页。

### 三

妇纺运动的开展,不仅使华北抗日根据地度过了灾荒,恢复了生产,而且也使农民的家庭收入增加,改善了农民生活,甚至在根据地的对敌经济斗争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更促进了妇女运动的发展。

纺织解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太行六专区仅武安一县,至1943年6月底止,纺妇共贷花104590斤,共获工资达268652斤粮食,解救了近8000名灾民的生命。磁武县白土村北街有13户讨口,后有5个妇女参加纺织,每天每人有半斤米收入,马上停止了讨口。晋察冀边区通过纺织业,至1943年2月,三专区救济了3000名灾民,四专区救济了2100名灾民。以前许多逃荒的农民,因纺织运动的开展,纷纷返回根据地。在山东根据地,几十万贫苦农民依靠纺织收入度过了春荒。妇纺运动成为根据地生产度荒强有力的措施之一。

纺织发展了农民的家庭经济。太行武安四区妇女从1943年至1944年,因参加纺织获得的收入共1359362.5元,平均每个妇女收入3771元,最多的收入10000元,最少的也收入700元。妇女们赚了钱,也开始置办田产,如太行区五分区模范纺娘王不四、王堂英趁灾荒地价贱,分别买进了4亩和12亩地。有的妇女家庭

---

《太行区1942、1943年两年的救灾总结》,见《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辑,第391页。

《生产运销救灾工作的初步检查》,见《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编),第715页。

薛暮桥:《山东抗日根据地内的纺织手工业》,见《山东革命历史资料选编》第12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9页。

《太行区1944年前半年纺织运动初步总结》,见《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辑,第273-274页。

吴宏毅:《从灾荒中站起来——记晋冀鲁豫边区的生产救灾运动》,见《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辑,第410页。

还购置了牲口和房产。

妇纺运动的开展,促进了根据地对敌经济斗争的胜利。在未开展纺织运动前,山东抗日根据地1943年单只军队所用布匹就至少需要15万匹,约值法币1亿元,以前都需要从敌占区购买,后因纺织的开展,解决了根据地布匹的需要。胶东、鲁中禁止洋布进口,滨海也逐步限制洋布进口,这样保证了根据地对外贸易的出超。到1944年,山东根据地可以织布80-100万匹,约值法币二三十亿元。晋绥边区的离石、临南两县,在1943-1944年两年中,除达到穿衣全部自给外,还供给军队40余万匹标准布。在太行区,由于实行自纺自织,停止洋布入口,等于每年减少25000石小米出口。不仅如此,冀南妇女在敌占区工厂倒闭,布匹缺乏的情况下,向敌占区推销布匹换回粮食,这样,打破了历来春夏本币跌价的规律,降低了汇价,使根据地有能力兑换大量棉花,在棉花争夺战上也取得了一定胜利。如太行区单公营商店在1944年4月前兑换了六七十万斤棉花,超过了原来计划,掌握了大量物资,争取了对敌经济斗争的主动权。

妇纺运动的成功,使抗战以来妇女工作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绩,出现了令人惊喜的新气象。

抗战初期,妇运工作的重心是动员妇女参战为主,这是当时客观形势需要。妇女工作在动员妇女慰劳救护、努力生产、战地服务、救济难民、保育儿童、锄奸警戒、宣传教育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因当时特殊的战争环境,妇女的宣传动员以及组织的建立,多依靠行政力量用强制手段自上而下地进行,因而,“各地只是

---

薛暮桥:《山东抗日根据地内的纺织手工业》,见《山东革命历史资料选编》第12辑,第259页。

《抗日战争时期晋绥边区妇女工作概况》,见《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第815页。

《太行区1944年前半年纺织运动初步总结》,见《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辑,第273-274页。

团结组织了少数青年、中年妇女，在成份上则以中农为多，而广大农村妇女基本上尚未发动起来”。1943年随着中共妇运方针的转变，妇女纺织运动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妇女运动与过去相比，令人耳目一新。

妇纺运动最广泛地动员了华北根据地各阶层的妇女，大批妇女投身手工纺织，使得她们在家庭和社会的地位得到了提高，家庭关系发生了变化。当时有许多妇女织布收入超过了男人的农业收入。如临县高俊花家3口人，男人和孩子种地12亩，共产粮2石8斗，她织布生产值粮3石6斗，另织布2匹付房租，此外还织4匹供全家穿衣，织布得奖金1200元入了合作社，因此，她收入占全家总收入的大半，改变了过去依靠男人生活的现象。由于纺织在家庭的经济生活、度荒中起了重要作用，因此，男人们都说：“这个年头男人是吃不开了，顶不住一个女人”，“现在男人要靠女人养活了”。家庭关系有所改变，妇女纺织，男人帮助烧火做饭，推碾，看小孩等现象比较普遍。过去妇女因为经济上不能自立而被轻视被虐待的现象大大减少了，家庭矛盾缓和，离婚率下降。如兴县赵家川口的白粉团，过去在家挨打受气，饿肚子，1944年学会纺织后不仅赚了粮食，并且还买了地，在家再也不受虐待了。

妇纺运动的开展，大大充实了妇女工作的内容，以前许多妇女团体的组织工作感到空洞没有内容，现在由于妇女买棉卖布，社会生活活跃起来，她们自己组织纺织合作社、纺织小组，纺织合作社和小组成为妇救会的重要成分，妇纺运动成为团结、组织、教育妇女的最好途径，妇运工作成为该时期民运工作最活跃的一环。纺织也改变了保守的观念，以前许多老人不准女儿或儿媳参加妇救会，现在反而鼓励她们参加，希望她们跟大家好好纺线。

---

参见蒲安修：《五年来华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妇女运动的初步总结》，见《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第690页。

《抗日战争时期晋绥边区妇女工作概况》，见《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第815-816页。

妇纺运动提高了妇女抗战的积极性。纺织救灾中出现并培养了不少生产能手,她们带动根据地妇女积极参予根据地各项建设,各种各样的妇女模范层出不穷。1944年5月,在晋察冀边区各种模范妇女大会上,表彰了大生产运动积极分子韩凤龄,青年妇女模范张小丑,纺织能手刘金荣、隰志华,饲养模范刘先和,建设新民主主义家庭模范王世兴、张树风,拥军模范戎冠秀,参政模范梁春莲、刘玉珍,优秀教员李翠珍,模范妇女干部张品。

随着经济地位的提高,妇女们对文化的要求也更加迫切,1944年冬-1945年春,大批妇女要求上冬学,仅晋绥边区的河曲、保德、临县、交城、偏关一县就有13628名妇女参加冬学。

妇女运动的新气象,真正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妇女文化政治的教育,应通过生产方式去进行”的巨大意义。

通过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妇女纺织运动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妇纺运动虽然是在根据地生产自救中发展起来的,但它与中共抗战时期妇运指导方针的转变有着密切的关系。“四三”决定为妇纺运动提供了具体的理论指导,反之,妇纺运动为中共实践其主张提供了重要的途径。妇纺运动的成功,再次证明了恩格斯“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劳动中去”理论的正确。以生产为中心的妇女运动的蓬勃发展对以后各个时期妇女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者刘萍,1965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

(责任编辑:刘兵)

---

《解放日报》,1944年5月1日。

《抗日战争时期晋绥边区妇女工作概况》,见《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第815-816页。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87页。